

從版本異讀之中能得到什麼？—— 從《光讚經》的文本研究來看《金藏》的歷史*

†左冠明 (Stefano Zacchetti)

英國牛津大學

摘 要：此文通過對於《光讚經》傳世的諸版本進行詳細的文獻學研究，在比較諸版本的異同之後，可以用此來側面證明李際寧所發現的關於《金藏》題記之中記載內容的準確性。此一題記中記載《金藏》的雕版在公元 1181 年曾經作過補版校正。除此之外，它還證明從文獻校勘的角度來看，僅就《光讚經》而言，《金藏》的文字是用另一個與《遼藏》有密切關係的版本來加以校勘修訂的。假如我們考慮到，大約同一時間，在金國首都附近《房山石經》的刊刻也是以《遼藏》為底本，那麼就非常可能，至少在所研究的若干例子之中，《金藏》是以《遼藏》自身為參照而加以校訂的。這項研究故而不僅對《光讚經》本身的文獻校勘，如果輔之以對其他經典的類似研究與發現，則可能會對中國佛教大藏經史都具有意義。

關鍵詞：《光讚經》、《遼藏》、《房山石經》、《金藏》、佛教文獻學

近些年來，在漢語佛教大藏經的歷史研究領域之內，取得了不少了不起的進展，這要特別歸功於東亞的學者。但是，除了相對少數例外，在此一花團錦簇的研究領域之內，卻有著若干局限。特別是在此一領域之中的大多數學者，都只關注我所說的大藏經及其諸多版本的“外在歷史”，卻很少對藏經內的那些經典有興趣。而另一方面，那些以漢語佛經來作為一些研究領域（佛教文獻學、漢語史等）中主要資料源的學者，又常常對他們所讀到的經典（通常是收在《大正藏》之中）是如何傳到了現在知之（或留意）甚少。

研究漢語佛經藏經文獻之中通常所缺乏的，同時也是我在此所主張的，就是對此二種方法作出綜合。更具體地說，就是在這篇短文之中，我將要盡量通過事例來說明，通過對大藏經之中經典的文字加以詳細分析，有時就可以得出若干古代版本的歷史信息，而這些則是其他資料之中所無法獲得的。

下面部分的基礎是我對《光讚經》（《大正藏》編號 222）的研究，此經是大乘《大般若經》的最早漢譯，此經於公元 286 年由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譯出。並且，作為一個警告，我需要強調，此文之中所得出的結論祇適用於這部《光讚經》，而（在沒有進一步研究的情況下）並不一定適用於整部大藏經。

* 本文是在第一屆國際大藏經研討會（佛光大學，2010 年 11 月）上提交（以漢語撰寫的）論文的修訂本，其資料完全來源於我 2005 年出版的對竺法護《光讚經》的研究專著。我發表此文的主要動機在於，本文之中包含有原典的圖片，這些圖片對我的觀點非常重要，但卻無法收錄在那本書中。我要藉此機會感謝方廣錫教授，感謝他在會議期間的評述給我的啟發。譯者：此文原文為“*What can we learn from variant readings?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Jin Canon 金藏 from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Guang zan jing 光讚經*”，發表於會議論文集《2010 年第一屆“國際佛教大藏經”學術研討會》，2011，高雄：佛光山文教基金會，頁 307–323。紀贊譯。

對漢語大藏經最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，就是將不同版本的古代藏經分成三大系統，其分類的標準就是根據其結構與內容（按照千字文號來對佛經的組織，某一部佛經的收入與剔除等），特別是根據其版式的特點。這種分類是由權威學者竺沙雅章與方廣錫分別提出。¹ 這三個系統的主要特點（就其版式特點而言）如下：

- 系統 1：每版 23 行，行 14 字；此系統源頭為最早的刻版大藏經，也即北宋年間的《開寶藏》（或如方廣錫（2006：343）所稱，即“中原系統”）；
- 系統 2：每版 27/28 行，行 17 字；《遼藏》或《契丹藏》系統（北方系統）；
- 系統 3：（一般）30 行，行 17 字；此系統中既有私刻也有官版，主要是宋代到清代中國中南部的藏經系統（南方系統）。

以此為參照，我就開始分析《光讚經》的文本，並校以不同版本（木刻版、寫經與《房山石經》），以便能得出一個此經的初步校勘本。作為第一步，我想要在這些不同版本之間梳理出其關係來，並遵循文獻校勘的常例，特別注意其中存在的共同訛誤，這些共同訛誤就對版本的系統具有指示性。

就總體而言，我的發現與上面提到的“三個系統的模式”相符，但是我對《光讚經》的若干研究（關乎所有三個系統的）結果，卻實際上有點更加複雜。

¹ 見竺沙雅章《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2000 年，第 281–287 頁與第 337–341 頁；方廣錫《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343 頁；亦參李際寧《佛經版本》（中國版本文化叢書）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53–57 頁（特別見頁 56 中關於方廣錫對包括《開寶藏》的“中原系統”的定義，《開寶藏》的經版實際上是刻於四川）。

為了行文簡練計，我主要只集中在一個問題，也就是系統 1 與系統 2 之中經典的關係之上。

在《光讚經》的例子之中，竺沙雅章的系統 1 (也就是方廣鋤的中原系統)，其代表為兩個版本：即所謂的《高麗藏》再雕本與《金藏》本，後者現在收於《中華大藏經》之中。²

眾所周知，系統 2 的祖本《遼藏》幾乎完全失傳，但是還有其他 (起碼部分) 以此藏為底本的藏經存世，特別是所謂的《房山石經》。在此藏之中，《光讚經》被刻在一組大型石碑之上³，刊刻年代為遼代，更為確切地說是公元 1048 年或者此年左右。

一般公認這種類型的石碑——它與大多數房山石經中的遼、金石碑完全不同，這些石碑尺寸更小，並且大略模仿木刻版⁴——可能是以《遼藏》為底本 (但並非全部如此，此點已經由何梅 1996 之中令人信服地加以證明了)。這一猜想在《光讚經》這個例證之中，也獲得了

² 事實上，《中華大藏經》之中所收的《光讚經》是由不同的版本拼湊而成：只有卷 1 與卷 10 是趙城《金藏》本 (或稱廣勝寺本，這是以發現此藏的寺院命名)，此本乃是《金藏》的主體；卷 2-3、5 與 7-9 則是採自 1959 年在西藏所發現的版本 (大寶集寺本，關於此本，見李富華、何梅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93-94 頁)；而卷 4 與卷 6 則來自《光讚經》(《高麗藏》本)。

³ 中國佛教協會、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《房山石經》(全 30 冊)，北京：華夏出版社，2000 年，冊 7，第 206-248 頁。

⁴ 見 Lothar Ledderose, “Carving Sutras into Stone before the Catastrophe: The Inscription of 1118 at Cloud Dwelling Monastery near Beijing”, *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*, vol. 125, 2004, pp. 432-439; 與 Lothar Ledderose, ‘Shi lei yinban: Fangshan Yunjusi shijing yu Qidanzang’ 石類印板：房山雲居寺石經與《契丹藏》(The Stones resembled printing blocks. The engraved Buddhist stone scriptures at Yúnjū monastery of Fāngshan and the Qidān canon). In: Christoph Anderl and Halvor Eifring (eds.), *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.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Christoph Harbsmei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th birthday*, Hermes Publishing, Oslo 2006, pp. 319-329. (亦參 Stefano Zacchetti, *In Praise of the Light: A Critical Synoptic Edition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hapters 1-3 of Dharmarakṣa's Guang zan jing* 光贊

有三昧名了幢英有三昧名金剛喻有
 三昧名入法印丹本云有三昧名善住王有三昧名放光无
 所奪有三昧名定意王有三昧名善

圖 1.《高麗藏》，
《光讚經》卷 6

若干數量不多卻重要的內部（也即文本）證據的支持。

《光讚經》的《高麗藏》本中，包含有三條行間注，引用了《遼藏》（稱為“丹本”）中的異文。這些注釋雖然數量不多，也存於此藏的其他經典之中，這些都反映了在《高麗藏》的刊刻過程之中，監修者著名僧人守其所做的傑出編輯工作。在所有的三例之中，《光讚經》（房山本）都與《遼藏》本有著相同的異文。當然，這並不足以完全證明（房山本）《光讚經》中就是《遼藏》，但至少其中一處（三處異文之中的第二處）的相同可能對做出這一結論更有份量。

我們討論的這處異文出現在《光讚經》的卷 6。以《光讚經》（《高麗藏》本）為底本的《大正藏》本（見圖 1），其文如下：

有三昧名入法印 丹本云有三
 昧名善住王 有三昧名放光無所
 奪……。⁵

除了《高麗藏》本，該三昧的這一特

經, *Being the Earlie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Larger Prajñāpāramitā*, Tokyo: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– Soka University (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III), 2005. pp. 108–109 以及注 153)。

⁵ 《大正藏》第 222 號，第 8 冊，第 190 頁上欄第 23–24 頁。

定名稱（有三昧名善住王）只存於《光讚經》（房山本）之中，⁶這也就證明了過去的猜想，即（房山本）的《光讚經》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《遼藏》本。⁷

我對竺法護《光讚經》的文獻學研究有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，就是《高麗藏》本、《金藏》本與《房山石經》有不少文字相同，而與南方諸藏（即竺沙雅章的系統 3= 方廣鋁的南方系統）有別：這不僅包括正確的文字——眾所周知，在不同的版本之間，正確的文字並不構成版本系統關係的有力證據——也包括其中的錯誤。⁸換而言之，《光讚經》的這三個版本（《高麗藏》、《金藏》本與《房山石經》），從文本的角度來看，似乎構成了一個單獨的版本系統，或者說一條傳遞線路，我姑且將之命名為“北方線”。⁹

⁶ 頁 232，行 29；不幸的是，已經說過了，《光讚經》的這一部分並沒有金藏本。順便說一句，這無疑確實是原文，而非錯訛。因為三昧的此名可以得到梵語平行本的證明（在句法上稍有差異）：samādhirājasupratīṣṭhito nāma samādhīḥ (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. Dutt, p. 199, 5；亦見吉爾吉特寫本的《大般若經》，見 folio 85r 12)。

⁷ 事實上，房山石經的背景非常複雜。正如何梅在她關於此一藏經的重要研究文章之中（何梅《房山石經與〈隨函錄〉、〈契丹藏〉、〈開元錄〉的關係之探討》，《佛學研究》1996 年第 5 期，第 262–272 頁，特別見第 272 頁）令人信服地證明了，有千字文號的房山石經刊刻的底本是《遼藏》以及公元 730 年以後雲居寺中所有的唐官方寫經（何梅《房山石經與〈隨函錄〉、〈契丹藏〉、〈開元錄〉的關係之探討》，第 264 頁）。由於一般認為《遼藏》自身也是以一個類似的唐代一切經為底本（見李富華、何梅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，第 152–156 頁；何梅《房山石經與〈隨函錄〉、〈契丹藏〉、〈開元錄〉的關係之探討》，第 269–270 頁；特別是竺沙雅章《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》，第 339 頁），《房山石經》與《遼藏》在若干字句之間之共同之處，也有可能是其祖本相同。

⁸ 具體見 Zacchetti, *In Praise of the Light*. pp. 123–124.

⁹ 亦見 Florin Deleanu, *The Chapter on the Mundane Path (Laukikamārga) in the Śrāvakabhūmi. A Trilingual Edition (Sanskrit, Tibetan, Chinese), Annotated Translation, and Introductory Study*, 2 vols.,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(Monograph Series XX), Tokyo: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, 2006. pp.117–118 及以後。

我們如何來解釋此一事實呢？《高麗藏》與《金藏》之間的關係當然並非出乎意料之外：此二種版本都直接或間接地以最早的刻版大藏經，也即《開寶藏》為底本。¹⁰《高麗藏》與《房山石經》之間有相同之處，也完全可以理解：我們知道（特別要歸功於守其的重要著作《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》）¹¹，《光讚經》（《高麗藏》本）的經典有數個來源，其中就包括《遼藏》，而我們看到過了，《光讚經》（房山本）也可能部分參校過此藏。

不過，公認《金藏》是嚴格地以《開寶藏》為底本，並且就我所知，研究此藏歷史的學者並沒有考慮過它與《遼藏》的關係。事實上，李富華與何梅在他們對於《金藏》的重要文章之中已經排除了這種可能性。¹²那麼，我們又如何能夠解釋《金藏》與《房山石經》在諸多文字上不尋常的共同之處呢？

為了回答此一問題，我們將要重新回顧一下《金藏》的歷史方面，接著我們再對《金藏》本作一個更為詳細的研究。

近些年來，由於李際寧發現了一份重要文件，¹³我們對於《金藏》

¹⁰ 當然，這樣說有點過於簡單化，因為所有屬於系統1的藏經版本的背景是相當複雜的。比如，此版的祖本，即《開寶藏》於公元983或者977年初雕出來之後（見竺沙雅章《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》，第315–318頁），又相繼被修版、編輯過數次，並且在此藏中添加了新的經典（呂澂《呂澂佛學論著選集》（5卷本），濟南：齊魯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冊，第1426–1428頁；亦見李富華、何梅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，第74–82頁）。在研究中國佛教經典時，要時刻記住這一複雜的圖景（這對絕大多數古代藏經的版本都具普遍意義）。

¹¹ 關於守其的這部著作，見Robert E. Buswell, “Sugi’s Collation Notes to the Koryō Buddhist Can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Buddhist Textual Criticism”, *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*, n. 9, 2004, pp. 129–184.

¹² 李富華、何梅《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》，第114–115頁。

¹³ 李際寧《金藏新資料考》，收於方廣錫主編《藏外佛教文獻》，第三卷，1997年，第446–463頁。後收入李際寧《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》，第33頁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7年。

雕版歷史背景與早期情況的瞭解有了重大的突破。這份文件是一篇題記，見於明代補刊的《磧砂藏》本之中，記載了明代初年此版的補刊情況。這份題記的開始部分，卻完全是在描述《金藏》的雕造與其勸募者比丘尼崔法珍（寫這篇題記之人將之當成是明代補刊《磧砂藏》的模板）的活動，因此也就包含有關於這些主題以前不為人知的信息。正如李際寧所指出的（在我看來非常有說服力），這篇題記是以一篇由趙沅所撰的失傳了的碑文為基礎。

除了其他信息之外，這篇題記還為我們提供了一處細節，這處細節對於我們從文本史以及校勘學的角度來研究《金藏》具有潛在的重要意義。它告訴我們，公元 1181 年，《金藏》的雕版被送到了金國的首都，朝廷命令五位通經沙門進行校正：

至二十一年進到京師。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，計陸千九百八十為卷。上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遵等五人校正。¹⁴

這條證據對研究《金藏》具有深遠的意義。讓我來強調一下此點：從《金藏》中此經的角度來看（這是最感興趣之處），這份題記所提供的是一份最為重要的信息。它告訴我們，即使《金藏》在其初雕時只是對《開寶藏》的機械複製（事實上，對此我們並不能完全肯定），但由於這一“校正”，後來《金藏》之中的經本就肯定比起其原本來有所不同了。

那麼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又有什麼線索瞭解《金藏》的刻版被作了哪些校正呢？首先，我傾向於相信，基於我對校勘一部藏經時，

¹⁴ 李際寧《金藏新資料考》，第 450 頁。李際寧《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》，第 12 頁。

傳統校勘學實踐會有哪些步驟的瞭解(我承認我瞭解並不多),在這段之中所提到的“校正”大概就是以其他(一種或多種)版本來參校此版。

但是那麼校正《金藏》雕版的這五位通經沙門又是參校以何種版本呢?題記中並沒有提到此點,不過,在《高麗藏》本《光讚經》中所引用的《遼藏》異文(即“丹本……”)為我們提供了線索,可以回答這一非常重要的問題。

此條引用見於《光讚經》卷9;在《高麗藏》本之中其文字如下(見圖2)

不以是故名為菩薩，亦無已字丹本亦不以空為菩薩也。

在此我並不想回答此一《遼藏》本的異文(“亦不以空”相對於“亦無已字”)是否正確的問題。¹⁵對我們討論真正重要的是,在此例之中《金藏》本的文字(亦無以空,見圖3)大體同於《高麗藏》本所引用的《遼藏》本(除了《金藏》中的“無”字《遼藏》中作“不”)。¹⁶在這一特定例子之中,我們所能做出的進一步推論就是,《光讚經》(《高麗藏》本)非常可能是反應了《開寶藏》中的情況。簡而言之,很有可能,在這一段之中《金藏》本是以《遼藏》或其他相關經本為基礎而作了校正。

當然,假如對《金藏》中的這一段粗看下來(圖3),我們必須

¹⁵ 對應的梵語平行本(吉爾吉特本《大品般若經》頁115r4;參《二萬五千頌般若經》*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*, ed. Dutt, p. 250, 24–251, 1),就總體而言與《光讚經》的文本非常不同,其文字為: *tena kāraṇenocyate nāmadheyamātram etad yad uta bodhisatva iti .//*。

¹⁶ 順便提一句,《光讚經》(房山本)也與《遼藏》中的這處異文相同。

者亦空字自然空不以是故名為菩
薩亦無已字不丹本亦為菩薩也復次舍利
弗六波羅蜜但以字耳不以字故為六



者亦空字自然空不以是故名為菩
薩亦無以空為菩薩也復次舍利弗
六波羅蜜但以字耳不以字故為六

圖 2.《光讚經》卷 9,《高麗藏》

圖 3.《光讚經》卷 9,《金藏》大寶積寺本

承認此一版刻並沒有校正的明顯痕跡，而且因為《高麗藏》本與《遼藏》/《金藏》的異文其字數都是一樣的。不過，在《金藏》本《光讚經》之中在此方面還有更能說明問題的其他段落。

以一個底本來覆刻或翻刻雕版的技術，通常會非常忠實地保存原本的格式與版式，並且在《金藏》與《高麗藏》之中都是如此，此二藏都是《開寶藏》的翻刻。因此，在這些版本之中的校正——更為確

切地說就是增加或刪除字數——通常就會改變原來的格式（比如就會出現某些行數中字數變多，字體變小的情況等）。

在《光讚經》就有若干章節，其中《高麗藏》保持了《開寶藏》的標準版式（一葉=14字X23行），而在《金藏》本之中則有對《開寶藏》校正的明顯跡象（並且有些文字也與《高麗藏》不同）：¹⁷ 這表明《金藏》本開始是以《開寶藏》為底本，在後來又做了校正。在此，我只能討論其中的一個段落，這一段從文本的角度來看特別重要。

它出現在《光讚經》的卷1（《房山石經》的卷2），此經的這一部份有著高度程序化與重複性的特點，由於在一段的開頭或者結尾有相似之處，這就導致出現漏掉幾個字甚至一整行的文字差異。在《大正藏》本（=《高麗藏》）之中，這一段（及相關校勘記）如下：

復次，舍利弗，菩薩摩訶薩解知眼¹空、耳鼻舌身意空者，此則為行。解色²空、聲香味觸法空者，此則為行。¹⁸

[1] 眼=色【宋】【元】【宮】【聖】。

[2] [色空聲香味觸法空者此則為行解眼界空者此則為行解色界] 二十五字—【明】，[色空聲香味觸法空者此則為行解¹⁹] 十四字—【宋】【元】【宮】【聖】。

與我們討論相關的部份是從“解色”開始的一段。為了行文簡練之故，我不會引用《中華大藏經》中的校勘記（在此作必要的修證後與《大正藏》之中的一致）；但是事情的要點在於，這一整段（即

¹⁷ 比如（《中華大藏經》中的注釋，見第7冊）：第767頁第2欄；第768頁第2欄第17-18行。

¹⁸ 這一段亦收於我對《光讚經》的節略校勘本§3.21之中（見Zacchetti, *In Praise of the Light*. pp. 216-217）。

¹⁹ 這個“解”字屬於下一段。

《高麗藏》之中的“色空聲香味觸法空者此則為行”) 在所有屬於系統 3 之中的藏經版本 (即屬於南方系統的藏經) 裡面都沒有。非常有趣的是, 這種缺失也存於《光讚經》從八世紀開始的日本寫經之中, 這些寫經抄於天平時期, 其異文在《大正藏》中引用時用的縮略語為“聖”。²⁰

或者換而言之: 這一段——肯定是真實的原本, 因為現存的梵語平行本中也有對應部份²¹——只見於《高麗藏》本 (見圖 5a-b)、《金藏》本 (圖 6) 與《房山石經》本 (圖 4) 之中。不過, 在這三個版本中, 其文字有兩類:

《高麗藏》: 解色空聲香味觸法空者此則為行

《金藏》、《房山石經》: 解知色空聲香味細滑所欲法空者
此則為行

這些異文本本身並不特別重要, 因為它們都是《光讚經》的常用術語。不過, 毫無疑問, 在《金藏》與《房山石經》之中, 保存著一個更為真實的文本: 姑且不提無關緊要的異文, 諸如“解知”相對於“解”, 在此二版本之中的“細滑”與“所欲法”都是對 *sparśa*

²⁰ 關於此寫本的詳細情況, 見 Zacchetti, *In Praise of the Light*. pp. 84–85.

²¹ 吉爾吉特寫本的《大般涅槃經》folio 20v 5–6 (見下面加黑體與下劃線的部份):
punar aparaṃ cakṣuḥśūnyatāyāṃ yukto yukta iti vaktavyaḥ evaṃ śrotraghrāṇajihvāk[ā]
yamaṇaśūnyatāyāṃ yukto yukta iti vaktavyaḥ evaṃ rūpaśabdagandharasasparśadharmā-
śūnyatāyāṃ yukto yukta iti vaktavyaḥ (亦參 *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* ed. Dutt p. 44, 3-5;
Śat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. Ghosha p. 136, 10–17)。注意在《光讚經》整個這一
部份之中, *yukta* 及其他從 *√yuj* 派生出來的詞, 其譯法多種多樣, 其中包括“解/解知”
與“行”, 後者見於這段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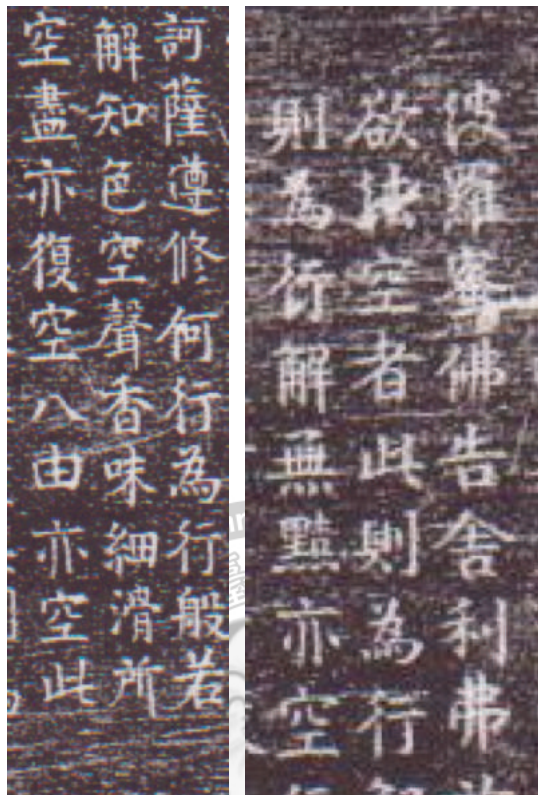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.《光讚經》，卷 2，《房山石經》，北京 2000，第 7 冊，頁 2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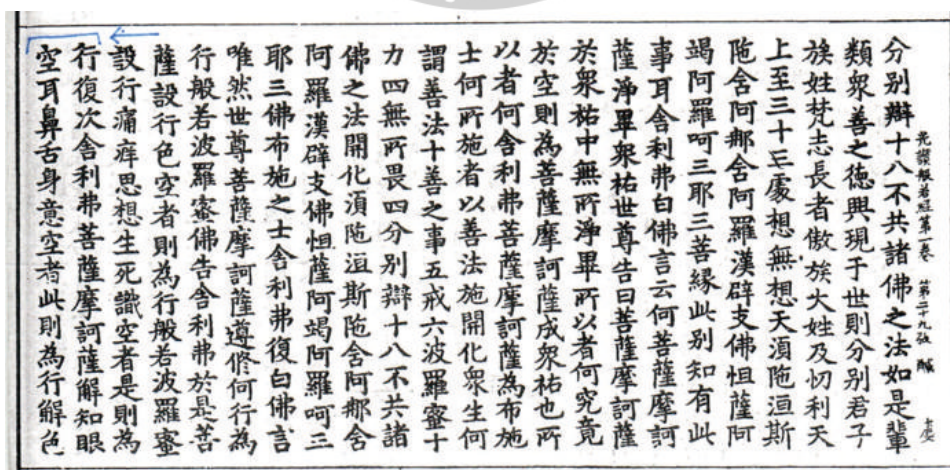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.《光讚經》卷 1，《高麗藏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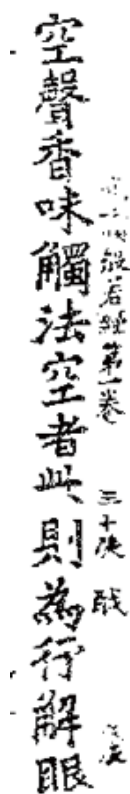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b

與 dharmāḥ (作為外在諸入系列中的諸項) 的古譯,²² 但它們在《高麗藏》之中,則被換成了後世的標準譯法(分別是“觸”與“法”)²³

假如現在我們來比較一下《金藏》本與《高麗藏》(見 5–6) 的影印件,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,後者在此段(一直到下一葉結尾,此下一頁的第一行也收了圖 5b 的第一行)之中一直保持著《開寶藏》的每版 23 行,每行 14 字的版款。與此相對,在對應的《金藏》本之中,這個版款則有極大的更動:此葉之中的這一段(圖 6)之中有 24 行,其最後三行(22–24)與《高麗藏》有不同之處,這三行中分別有 15、16 與 15 個較小的字。正是在這部分之中,它顯示了對原始《開寶藏》版式的更動,《金藏》的文字則與《房山石經》相同。

從這些事實之中,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很明顯的結論:在此《光讚經》(《高麗藏》本)很可能保存了《開寶藏》的原始文字,而另一方面,《開寶藏》的原始文字又在《金藏》中以另一版本為基礎作了校正,此一《金藏》版本又與《房山石經》有密切的聯繫,這部《房山石經》幾乎肯定就是《遼藏》。在此例之中,在《金藏》本與《房山石經》之間的聯繫具

²² 見 Zacchetti, *In Praise of the Light*, p. 339 n. 76, 77. 注意在早期翻譯之中“細滑”很是常見,但“所欲法”則非常罕見(雖然在《光讚經》中的其他地方也有)。

²³ 值得指出的還有,《金藏》與《房山石經》本之中的此節都是 18 個字,這個數字接近於唐代官寫經的每行字數(17)。這種情況可以被當成是一個額外的證據,以證明《金藏》與《房山石經》中的文字是正確的。它事實上,也可以解釋所有南方系統的藏經版本(以及天平寫經=聖)為什麼都沒有我們討論的這一段:這是因為它們所依據的一個或多種底本之中,在抄寫某一官版寫經時漏掉了一行。

在若干例子之中,《金藏》是以《遼藏》自身為參照而加以校訂的。這條信息雖然初看起來很小,但它不僅對《光讚經》的文獻校勘,如果輔之以對其他經典的類似發現,則可能對中國佛教大藏經史都具有意義。我還想再次強調,如果僅僅通過我們現在手頭上所有的歷史資料,則不可能獲得這條信息。

